

创刊号

# 北大中文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 编  
费振刚 温儒敏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费振刚,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ISBN 7-301-03754-6

I. 北… II. ①费… ②温… ③北…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  
-期刊②汉语-研究-期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690 号

书 名:北大中文研究 (创刊号)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文系 编

责任编辑:谢茂松

标准书号:ISBN 7-301-03754-6/I.0482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5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 编辑人员名单

### 主编：

费振刚 温儒敏(执行)

### 编委：

孙钦善 孙 静 乐黛云  
李小凡 陈平原 陆俭明  
费振刚 徐通锵 郭锡良  
曹文轩 蒋绍愚 谢 冕  
温儒敏

### 学术顾问：

王岳川 王福堂 孙玉石  
安平秋 何九盈 张少康  
沈 炯 严家炎 陈熙中  
金开诚 周先慎 周 强  
袁行霈 倪其心 洪子诚  
钱理群 符淮青 葛晓音  
褚斌杰 裘锡圭 刘 烜

### 执行编辑：

吴晓东 陈保亚 黄 丹

## 编者前言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北大中文研究》辑刊正式创刊了。

我们希望辑刊能成为展示北大中文系教学与科研成果的一个窗口,又是本系与兄弟院校中文系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园地。辑刊应当能体现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能代表一种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辑刊主要刊发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汉语史、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学科前沿的研究信息,讨论跨学科的学术生长点,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等重大问题。我们希望它能不断促成自由健康的学术对话,产生理论“刺激”,活跃学术空气。

和一般论文集不同的是,辑刊还格外关注中文教学的问题,诸如课程与教材的改革,研究生的培养,具体科目的教学经验,乃至中文系普遍面临的挑战与困扰,等等,都可以作为辑刊讨论的一方面内容。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提示一些切实的思路。

辑刊主要刊载本系师生的学术论作,同时以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发表校外来稿,尤其欢迎推荐优秀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

辑刊由北大中文系主办,每年出版一至二辑,国内外公开发行。

# 目 录

## 兄弟院校系主任笔谈

|                  |        |
|------------------|--------|
| 以文为主 文理结合 .....  | 徐葆耕(1) |
| 两难之境与我们的出路 ..... | 陈 洪(5) |
| 中文系要打“中华牌” ..... | 赵宪章(8) |

## 孖民学术论坛

|                         |         |
|-------------------------|---------|
| 五四·文革·传统文化 .....        | 严家炎(11) |
| 文学研究中的新方法 .....         | 杨 义(21) |
|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与文学研究的回顾 .....  | 葛兆光(30) |
| 五四时期的科学问题与教育体制改革 .....  | 汪 晖(47) |
| 面向当代科技的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袁毓林(56) |

## 古典论丛

|                            |          |
|----------------------------|----------|
| 近代文学研究与古文基础 .....          | 孙 静(73)  |
| 从气骨顿衰到高情远韵——论大历诗歌之新变 ..... | 孟二冬(84)  |
| “阮旨遥深”和“嵇志清峻”的比较分析 .....   | 汪春泓(104) |

## 文化与文学

|                        |          |
|------------------------|----------|
| 后殖民主义“话语”透视 .....      | 王岳川(116) |
| 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 .....       | 钱志熙(137) |
| 北宋前中叶的尊韩思潮 .....       | 顾永新(154) |
| 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 ..... | 陶礼天(178) |

## 文学百年

- 何其芳的《岁暮怀人》及一组佚诗…………… 孙玉石(197)
- 求雅与随俗——抗战时期的新文学小说…………… 孔庆东(211)
- 空间·人·乌托邦
- 论金庸小说“江湖”与“武林”的正反二重性 …… 宋伟杰(226)

## 语言学之页

- 臧钟铭文考释…………… 李家浩(249)
- 甲骨刻辞中“名+数”结构的语法性质…………… 邵永海(264)
- 论汉语单字格局向双字格局转变的原因和途径…………… 叶文曦(273)
- 对汉语语法研究历程的一点思索…………… 李 娟(297)
- 总括副词“都”的历史演变…………… 杨荣祥(310)
- 汉语变调构词的若干理论…………… 孙玉文(333)

## 美学研究

- 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 张 辉(354)

## 版本研究

- 戴复古诗集版本源流分析…………… 王 岚(382)

## 教学改革探讨

- 关于人文学科博士生的培养…………… 袁行霈(407)
- 现代汉语系列化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陆俭明等(411)

## 以文为主 文理结合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徐葆耕

在清华中文系当主任很难，一是历史的包袱太重：照王瑶先生的说法，朱自清先生主持的中文系是当时最进步、最开放的一个系，是闻名遐迩的“清华学派”的骨干力量。沧海桑田，今非昔比。作为后继者常自愧弗如。二是现在的清华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进军，理所当然地中文系也应争个一流才是，但事实上清华以工科为主，给文科定了个“小而精”的紧箍咒，使得中文系至今发育不全，有些本科和研究生的课还要依赖邻近北大中文系。

面对强大的理工科，我们常觉自己是清华园里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难免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但也得承认，“大汉族”也给了“少数民族”不少帮助。如何面对时代的需求和现今清华的优势来发展自己，就成了当系主任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八五年一复建，我们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叫“以文为主，文理结合”，先办了个“工学士+文学士”的六年制科技编辑专业，又开展了计算机语言学的研究和培养复合型硕士研究生的工作。94年起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中，有数学、物理和三门计算机课程，到了三年级分两个专业方向：科技与文化传播、比较文学，前一个专业方向还要再补一些科技知识，后一个方向搞本硕贯通，侧重于文学和外语的训练。科技编辑专业办了十一年，毕业九届学生，计算机语言学硕士毕业了六届，很受社会欢迎。科技编辑去年又获准建立“传播学”硕士点，还获得了北京市教学改革一等奖。

我们觉得，搞“文理结合”也并非权宜之计。现代科学技术

无孔不入,对理工科全然不懂的文科毕业生只能做个“边缘人”,不能进入社会主流。近代大学教育搞文理分家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但文科与理工“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给人的知识构成带来很大的片面性。早在本世纪初,欧美许多学者就强烈关注这个问题。很多的大学都在强化“通识教育”。我看到过一份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表,它的通识教育分成六组,其中包括文学与艺术、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分析、道德思想、外国文化。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学习一些科技课程,其目的并不在于用这些知识去解决科技方面的具体问题。哈佛八十年代通识课程的设计者罗诺索夫斯基说:“这些课程的共同目标是对科学进行一般性和广泛性的认识,作为观察和了解人类和世界的一种途径。……所要深入探讨的重点是这些科学的概念及发现,不是个别探究某一门科学的专门知识,而是探讨其发现和发展如何形成原理法则进而影响人类与世界。”(载台湾通识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63页)按照哈佛的要求,他们的文科学生所学的科技课程有两组是必修的,一组科目是“对自然现象运用数量处理各项因素来预测和演绎的分析”(主要为物理、化学、某些生物学);另一组科目则分析比较复杂的科学系统,其内容包括对自然界作描述性的、历史性的或演化性的解说,如“地球与生命的历史”等课程。看来,哈佛文科的理工科课程比我们还多,门类也更丰富。95年在威海开全国大学中文系主任会议,南京大学的同志提出中文系应设十三门主干课,其中有两门(数学、计算机)是理工科课程,这表明我们的文科也在向着“文理通识”的方向走。

“文理结合”的要义并不在于念多少科技课程,而是让文科学生把握自然科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早提倡“文理会通”的是胡适,他在本世纪初就提倡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进人文学术研究。逻辑方法的引进也是改造中国学术使之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二十年代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看似科学与玄学两种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相激相荡,其实也是相汇相融。其时清

华大学的文科学生也是要修习科技课程的,至少要有一门理科成绩才准予毕业。不仅文科研究需要吸收自然科学思维,理工科的研究生也需要直觉与想象等艺术思维,这一点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和薛定谔都曾现身说法予以证明。近二十年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不仅为人文学科提供了工具,而且也将导致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纵观二十世纪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从分析走向综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哲学与方法论层面上的融合贯通将是学科综合的最高成果。因此,我在 95 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题目叫“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家热线”让我去讲话,我讲的主题是“走出半人时代”也是提倡人的情感和理性、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协调发展,这个讲话的提纲后来发表在《大学生》杂志上。

“文理会通”说起来很玄,其实也并非不可捉摸。何兆武先生认为,“清华学派”的学术理路就是“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何先生列举诸多事实表明此说并非虚妄。当然,作为本科生的培养,只能为“文理会通”打一点薄薄的基础。清华教务处拨专款请造诣很高的教授研究“文科物理”和“文科数学”。清华中文系很难在经典学科上作出高于同仁们的大贡献,也许在文科的理工科课程方面能为朋友们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从我的经验看来,让理工科学生读点文科课程阻力不大,多数学生饶有兴趣。但让文科学生读理工科课程却是个不小的挑战,有些文科学生具有“科技恐惧症”,总觉得自己搞不懂那些劳什子。造成这种恐惧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尚没有专为文科学生开的理工科课程,而为理工科学生开设的理工科课程往往有繁复的量化要求和过于具体的探索。为此往往需使用大量的数学推导,使文科学生如堕万里云雾之中,相反,为文科学生所需要的对于自然科学的思维理论、方法的阐述颇为缺乏。克服了这些缺点,科技课程将对文科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学生会惊喜地从中发现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和视角,对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智慧极具启发。

在大学本科的文科教育方面,我们也还有一些不成熟的设想,譬如,实践闻一多先生关于打通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构想,打通本科教育与硕士生培养的构想。我们还压缩了文学史课程的学时,增加了经典著作的导读课程。文学史课可以帮助学生从客观上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很重要的,但文学史的架构带有很大的人为性,适当增加文学经典的导读,可以作为文学史的重要补充。经典本身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只有直接接触经典,才能培养学生的“原创型思维”,不致被人为的文学史架构所束缚。同时,增加经典阅读也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与分析的基本功,对改变目前一些文科学生不读书,单凭几本外文刊物和时髦名词就写文章的浮躁风气。

1997年3月于清华园

## 两难之境与我们的出路

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陈 洪

马克思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这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明的进步之路上，传统与发展的永恒矛盾。当下，我国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主题与深厚的传统也正纠葛在一起，使我们处于一种两难之境：在本科教育中，传薪的责任与发展的机遇似乎不可兼得。这既表现在很多具体实在的问题上，也表现于诸如教育思想、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等根本大计之中。

先看具体问题。首先是生源。从表面看，近年来中文系的本科趋“热”，如我系的录取分数线便经常居于法学、房地产等热门专业之上，绝无匮乏之虞。但是，若分析一下考生及其家长的心理，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过去中文系考生在专业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当作家”，这“虽不中，亦不远矣”。而现在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专业认识，有的不过是“就”业认识。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完全是坏事，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免于哲学系那样的生存危机，而且似乎也提供了某种“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生源毕竟与中文系的基本性质不甚相合。在教育实践中，培养这部分学生的专业兴趣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往往对技能性、应用性的课程更感兴趣，而对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的专门性课程敷衍了事。这当然是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所致，而且是整个教育工作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但对于中文系这样的传统性很强的基础性学科，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些。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毕业去向。一般来说，中文系的学生不愁分配。但由于社会职业结构的调

整,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从事的是机关干部、企事业秘书等实际工作,虽与本专业的联系不甚紧密,待遇却较好。其正面影响是提高了中文系的社会“声誉”,形成上述生源状况;负面影响则既对考生有所误导,也直接降低在校生的专业热情。其次是师资。在当前的形势下,安心学术实乃清贫之同义语。这对不同年龄段的教师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中年教师多有所旁骛(广义),而青年教师则易于流失。顺应之,则必导致学术水准下降;矫正之,则难于维系人心。复次,如办学条件、办学规模等,也处于类似的困境中。

这些具体问题固然使我们困惑,而更深的困惑还在于具体问题的背后。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教育改革应该面向市场经济,应随“人才市场”的行情运作。显然,若依此办理,中文系会有所“发展”,但代价不仅是丢弃自己的学术传统,而且还将放弃文化传承、文化建设的责任。也有相反的观点,主张强化传统,借鉴海外,增加“国学”的色彩。这无疑将有利于发展学术,弘扬传统,但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难题:按这样模式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大部分应该继续读研,而目前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远不能容纳;若不读研,现在的文化、教育部门亦远不能提供足够的专业性职位;若从事其他行业工作,这样的知识结构则较难适应。与此相关联的是课程体系问题。现状是总学时、总学分有限而偏紧,其中又有百分之四十为非专业必修课,在剩下的学时中,三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应用类课)互相排挤,甚难兼顾。在理想状态下,专业基础课应宽、厚、扎实,使学生从中得到几套“看家的本领”,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专业选修课应形成系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互补,既给学生以知识,更示之以研究门径;应用类课则应避免散碎,避免沦于职业培训的水平。但是,在现行学制及学时、学分的制约下,不仅理想状态的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三者取其二,并保证各自的充分与系统,也是相当困难的。这种情况下恐怕势必有所取舍,可是简单地取此舍彼,又不免要在教育思想、培养模式上面临上述之两难困境。

近年来,我们在教学改革与基地建设中,对这种两难之境深有体会。至于如何走出困境,我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探索。虽然未臻柳暗花明,但也略有芹曝之得,大致为以下几点:

1.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综合大学的中文系似应将自己的办学目标定位于“培养专才为主,辅以通才教育”。理由有三:社会需要语言、文学方面的专门人才,这种需要当呈逐渐扩大之势;综合性大学目前毕竟为数不多,理应担当起培养专业人才“国家队”的责任;鉴于目前的生源与就业情况,通才教育亦属必要。

2. 这种主辅兼顾的目标,可通过“分流”的方式来实现。具体作法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全体学生的专业素质与文化素质;梳理、调整选修课,通过选课实现分流培养。

3. 为在有限的学时、学分下,实现加强基础课的初衷,我们采取了适当减少基础课门数,相应增加主干课程学时的作法,确保古代汉语、古典文学、文学理论等重头戏唱足唱好。

4. 相对而言,选修课的学时、学分有所减少。为此,我们对现有选修课进行了梳理与筛选。严格专业选修课的审批程序,杜绝因人设课,提高这类课程的学术水平;挖掘潜力,尽量使专业选修课成龙配套;强调这类课程的启发性、示范性,使其在教学方法上有别于基础课。应用类选修课则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主要目标。

5. “分流”在第三学年进行。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任课教师与班级导师的作用,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引导,以期达到“各得其所”与“因材施教”的目的。

以上想法与作法未必尽妥,不过是试验而已。北大同仁设此“系主任论坛”,实为推动中文专业教改之盛举,故不揣谫陋,呈教于大方之家,以尽摇旗呐喊之微力。

## 中文系要打“中华牌”

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赵宪章

近年来,南京大学中文系通过总结和梳理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确定了“依靠学科优势,打‘中华牌’,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汉学教育与研究”的办学思路。实践证明,这一思路符合当前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实际,当为中文学科在当前条件下获得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中文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中国汉学研究最传统的学科之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不少院校的中文学科难忍诱惑,或经商,或转向,或一味迎合某种需要办学,致使本学科的形象面目全非。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所面临的这一空前严峻的困境,怪罪不得任何一个校长或系主任,只怪罪商品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太残酷、太无情。但是,每位校长或系主任都有责任面对新的现实为中文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机遇。这一机遇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由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在世界范围内所形成的“汉学热”。中国需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接纳中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恰恰是作为基础传统学科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之所长,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九十年代以来,我系先后主办了“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茅盾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这四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世界各国近百位最著名的汉学家和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

者,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从而为我系的国际交流架设了桥梁。以此为契机,我系同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二十余个著名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关系,互派教师或学生,合作研究或资料交流,等等,成效显著。这不仅对于光大中华文化、推进世界汉学教育与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我系自身的学科建设,甚至对于拓展办学经费的渠道、改善我系办学的物质条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文学科依靠自身的学科优势,打“中华牌”,积极参与国际汉学教育与研究,这当是一个天经地义、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具体操作却并非轻而易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就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情况来看,其困难主要不在于我们没有对外开拓的能力,中文系的很多教师本来就与国外的许多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源很多很多;困难主要是目前我们在对外交往方面的“关卡”太多,对外交往的各种关系没有理顺。例如,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力量大多集中在中文、历史、哲学等等基础系科,但是,这些系科却没有开展外事活动的主动权,因而并不是对外汉学教育与学术交流的主力军。相反,学校又另外划出一片田地,成立了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所谓的“中心”或“海外教育学院”,这些所谓的“中心”或“学院”反而成了学校开展对外汉学教育和学术交流的主力军,并享有各种特权或优先权,人为地制造了“行业垄断”。于是,在高等学校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局面:一方面是实力强大的汉学教育与研究的系科,另一方面又设置了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中心”或“学院”;一方面,真正能够代表一个学校和学科水平的系科被冷落,另一方面,对外汉学教育和学术交流的主动权、优先权和特权,又被那些所谓的“中心”或“学院”所占有。

可见,作为传统基础学科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要想打“中华牌”,尽管天经地义、合情合理,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并非轻而易举。只有

理顺各种关系,得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使我们的国际汉学教育与学术交流打开新局面。否则,中文系打“中华牌”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一纸空谈。

1997年3月24日

## 五四·文革·传统文化

严家炎

当前,对于“五四”的重新评估,可能导源于美国的一位学者,他就是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毓生先生。他有一本书《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国际汉学界颇有影响。80年代中期,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以后,在我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中,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90年代初,我校哲学系的陈来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响应林毓生先生的著作,叫做《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发表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他们两位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也是朋友,但是在评价五四文化运动的具体问题上,看法还是很不一样的。大体上说,他们的观点比较激烈,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这种彻底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用林毓生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林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而首肇其端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来先生的文章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所肯定,但是却也认为,主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文化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对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激烈态度。他从“五四”联系到文革,联系到80年代重新提